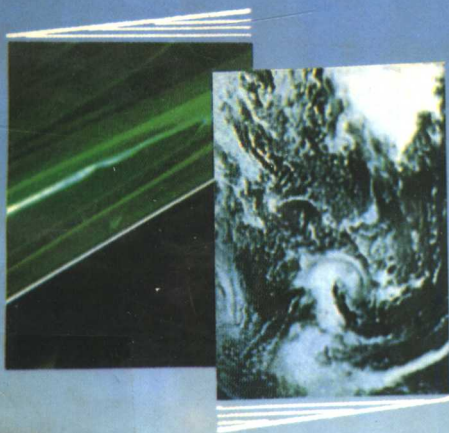


● 刘增杰主编 ● 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丛书

文学的潮汐

● 刘增杰 著 ● 河南人民出版社



I 206.6 / 429

● 刘增杰主编 ● 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丛书

文学的潮汐

● 刘增杰 著 ● 河南人民出版社

(豫)新登字 01 号

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丛书

文学的潮汐

刘增杰 著 责任编辑 杨吉哲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

荥阳县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625 字数 210000

1992 年 8 月第 1 版 199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215-02026-6/1·208 定价(精)7.55 元 (平)5.35 元

《中国近现代文学研究丛书》前言

本丛书是由河南大学中文系近、现代文学研究室编辑的一套专题研究丛书。

近年来，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突破。然而，许多研究领域，仍期待着新的开拓。这套丛书，我们既着眼于纵向延伸，打破近代、现代、当代文学的研究界限；又向往于研究工作的横向拓展，对某些尚待深入探讨的课题，作了一些初步的专题研究。我们深知自己才疏智拙，力难胜任。我们唯一能够做到的，只是孜孜不息地求索，向读者献上自己诚实的思考。

这套丛书，以收录青年研究者的著作为主，兼收部分年长学者和中年学者的研究成果。它大体上反映了我们这个现代文学研究群体的实际面貌。许多年来，作为一个研究群体，我们倾心吐胆，朝夕切磋。这些专著，虽主要来自执笔者的个人努力，但也渗透着师友的情谊和心血。一些由硕士学位论文、博士学位论文扩充而成的著作，更是国内有关专家精心教诲的结晶。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套丛书也是一种纪念，一段温馨的记忆。

本丛书的出版，得到了河南人民出版社的多方关怀和支持。他们为本书出版所付出的辛劳，我们表示由衷的感激。

丛书分两辑出版，第一辑初步选定四种。

1991年10月

目 录

文学的潮汐.....	1
19 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序幕——罂粟花文化与炮舰的强行登陆 ——选择起点的困惑——19—20 世纪文学的价值取向——文学参与历史变革过程——现实主义主潮——思潮发展的显著特征——对文学思潮的理性把握——世纪性的文学思潮家	
四十年代文学思潮论纲	15
一个别无选择的时代——四十年代文学主潮——工农兵文学思潮的勃兴——七月派的发展路径——历史剧创作潮——讽刺与暴露创作潮的汇流——反思创作潮的崛起——浪漫主义的历史命运——九叶派诗潮——沦陷区文学的三种形态	
历史转换期文学路向的两次调整	29
搅乱了文学秩序——文学队伍的新组合——文化中心的转移——传播媒体的衰落——第一次调整：文学观念的倾斜——第二次调整：走向文学形态的多样化——对于一个具体问题的辨正	
时代大潮与小说形态	46
历史意识：世纪性的眼光——社会思潮与小说发展——救亡小说：张扬民族意识与群体意识——思潮变迁与小说演进——匆忙的世纪，浮躁的文学	
作为文学思潮家的胡风	57
思潮家的目光——理论体系的建构——揭示“精神奴役的创伤”——主观战斗精神口号的提出——创建文学流派的主旨：“对民族斗争寄付一瓣微忠”——一位命运坎坷的历史角色	
思潮鳞爪	71

流出生命的自我——文学的闪光点——大河——大众化功不可没——流线型汽车和独轮小车——作家心态与文学风貌——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破除心理惰性——力戒苛求	
关于开拓现代文学研究格局的思考	81
以开放的眼光，纵向延伸研究时限——横向拓展研究领域——向文学的内层伸展——进行新的审视：科学描述的追求	
一个具有完整形态的文学运动	92
一个新的文学运动的兴起——发展的四个时期——工农兵文学理论的纲领化——从拓展到萧条——“左”的文学思潮的干扰	
论解放区的文学社团与作家群	106
从中国文艺协会到特区文艺界救亡协会——文艺社团的三种形式——赵树理及晋绥青年小说作者群——晋察冀诗人群——文学月会作者群——贡献与局限	
解放区短篇小说创作群体透视	131
四峰并立，短篇小说创作群体扫描——丁玲的社会剖析小说——赵树理的大众化小说——孙犁的抒情小说——刘白羽的军旅小说——时代精神与艺术个性——短篇小说创作群体的走向	
丁玲、王实味与延安文学新潮	140
从工农兵文学思潮到延安文学新潮——延安文学新潮的特质——新潮的天折——挑战与互补——一点历史教训	
期待着深化的研究领域	153
时代的选择：民族意识的呼唤——独特品格——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变革——文学观念的嬗变——研究现状的反思——两种研究倾向透视——实现与研究对象的真正接近	
救亡文学大潮下的一朵浪花	166
《风雨》周刊与救亡文坛——大时代的记录——救亡文学理论的探讨：大众文学风格的追求——在鲁迅的旗帜下	
略论梁启超散文的艺术魅力	175
梁启超的复杂性——摇撼心灵的激情——新的散文形式——脱离陈规，戛戛独创：精湛的语言艺术——梁氏散文的影响	

从《河南》杂志看鲁迅早期文学活动的若干特色·····	188
《河南》杂志与鲁迅早期文学活动——鲁迅文学思想特征——“运输精神的粮食”：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译介——呼唤精神界之战士	
祥林嫂形象塑造种种·····	200
祥林嫂出场的精心设计——人物命运史的出色描绘——精确的肖像描写——给人物以生命的个性化语言	
匠心独运 妙笔生辉·····	211
《子夜》的艺术构思——主人公别具一格的出场——开掘人物的内心世界——陪衬、烘托、对比——30年代初期都市生活的历史画面	
《憩园》艺术断想·····	217
用忧郁的调子讲故事——写出了人物的感情深度——深沉蕴藉的艺术风格——炽热的情感隐藏于外表冰冷的客观叙述中	
一位默默的文学耕耘者·····	223
难忘的文学启蒙师——初试锋芒——获《大公报》文学奖——创作旺盛期的来临——创作领域的拓展——艰难岁月——晚年风雨	
丁玲与解放区文学·····	246
丁玲与陕北——创作思想的变化——社会批判意识的强化——创作模式的突破——新的追求及其局限	
姚雪垠前期创作的语言风格·····	255
在文学语言上的不懈追求——变化与稳定的统一——单纯与丰富的统一——创作实践与理论探索的统一	
后 记·····	267

文学的潮汐

——《19—20 世纪中国文学思潮史》前言

19 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序幕——罂粟花文化与炮舰的强行登陆——选择起点的困惑——19—20 世纪文学的价值取向——文学参与历史变革过程——现实主义主潮——思潮发展的显著特征——对文学思潮的理性把握——世纪性的文学思潮家

19 世纪上半叶，当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文学思潮相继奔突涌动于欧洲文坛的时候，远在东方处于相对隔绝的地理环境中的中国文学对欧罗巴土地上的喧闹浑然不觉。它依然我行我素地在传统艺术的矩阵中高蹈徘徊，孤立孑行。此时，清王朝乾嘉盛世的釉彩正一块块脱落，从浩如烟海的经史书卷中熟谙盛衰之机的封建士人，在山雨欲来风声鹤唳之中，嗅到了变局在即的气息。他们象惊秋之落叶，向全社会发出了“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危机预告，惊盛世之秋，救衰世之敝的呼喊，拉开了 19 世纪中国文学思潮的序幕。它所显示的忧患意识与悲凉之气，成为 19—20 世纪中国文学的基本情结。

之后，是鸦片战争的爆发。帝国主义用罂粟花与炮舰强行打开

了中国闭关已久的门户。侵略者的强暴行径，打破了天朝盛世万世长存的梦幻，也粗野地蹂躏着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主权观念。中国以被迫的姿态和充满屈辱的地位，开始了和世界的对话与交往。

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近代史，是帝国主义不断将中国变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人民自强不息、前赴后继探索民族新生之路的过程。伴随着西学东渐，中国人也在极力张扬生生不息的民族文化精神，进行着重铸民族灵魂和“周邦虽旧，其命唯新”的伟大事业。在血与火的历史变革与演进中，中国文学开始了从古典向现代的艰难蜕变。新岸与旧梦的悖反，感情与理智的冲突，对传统文学的取精用弘，扬弃取舍，对异域文学的吸收借鉴，融汇整合，星换斗移，潮涨潮落，辞旧而迎新，整个 19 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步履蹒跚。但它走向新生的阵痛，构成了中国文学由古典走向现代过程不可或缺的一环。如果我们把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的历程比作一出长剧的演出，那么，近代文学的发展正恰恰可以看作是它的序幕；甚至也可以这样说，是为这场演出所作的实际准备，架设的一个宽敞多姿的舞台。正因为如此，我们把 19 世纪和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思潮放在一起加以考察。本书首卷作者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如果说，近代中国文学是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的发轫、准备与起步，那么现代文学革命则是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的第一个高潮、第一次飞跃。因此，我们认为，现代文学革命是在近代文学变革基础之上的更深入全面的发展。现代文学不仅继承了近代文学的反帝反封建和启蒙主义优良传统，而且把近代文学从思想文化到文学形式变革的成果也都继承了下来。近代先驱者们的历史悲剧也从反面启示了后来者。现代文学革命的起步，不仅包含了对整个传统文化与文学的深刻反思，同时也包含了对近代文化与文学的反思，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理

解近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历史联系。”^①这一认识，经过磋商研讨，终于得到了本书所有撰稿人的普遍认同。

当然，这一认同也还远远不能够说明我们把19世纪文学作为文学走向现代进程起点的全部动机，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第一分册《流亡文学》的结束语中，勃兰克斯在谈到他撰写该书为什么以19世纪作为起点时说过：“整个一个洲的半个世纪的文学史显然不可能是在哪一个特定时刻开始的。文学史家选择一个起点总不免有些武断和偶然。他必须信赖他的直觉和批判能力，否则他永远没法开始写作。”^②不能不说，我们撰写本书时，同样遇到选择起点的困惑，寻觅到作为文学史起点的唯一“特定时刻”是不可能的。我们选择19世纪初年作为论述的起点，虽然也有如上述的种种理由，但显然也有如勃兰克斯所云，“总不免有些武断和偶然”。驱使我们作出抉择的，可能也竟是在阅读史料时产生的一种朦胧的感觉，感受到的那一丝并不十分明显的文学新潮开始在传统文学母体中骚动的信息。

也可以这样认为，这一起点的选择，还来自我们无法掩饰的对于研究对象的偏爱，我们似乎看到了作为一个整体的、长达将近二百年的文学之河的流动，看到了它那由滞而缓，由缓而急，急中有回流，回流中又有新的冲决和流变的节奏变换，以及在变换中所呈现的特有异彩。停滞孕育着突破，曲折中包含着丰富。中国文学之潮裹挟着泥沙，以百川聚海般的气势走向未来的阵阵涛声，鼓起了我们跃跃欲试的热情，并把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投向以19世纪为起点的中国近二百年文学感情世界的追踪。我们在这里坦诚地剖白个人的偏爱，意在说明：我们绝不想把自己的认识强

① 关爱和、解志熙、袁凯声：《〈中国近代文学史〉绪论》，见《中国近代文学史》（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② 勃兰克斯《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03页。

加于人，或者借用胡适的话：“决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①。也许可以这样认为，我们的这一选择，充其量只不过便于陈述我们的思想观点。

二

在中华民族的文明进化史上，19—20 世纪是风云诡谲、沧桑巨变、沉重而又辉煌的年头。与古老的封建制度揖别，扫荡旧时代的污泥浊水，经历凤凰涅槃式的痛苦走向民族的新生；摆脱殖民主义的奴役，挺直民族脊梁，以东方巨人的雄姿重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民族自新与救亡图存，是特定时代、特殊的民族生存环境，赋予 19—20 世纪中国人无可选择的历史重任。国家、民族的生存与进步，以无形的力量，从总体上规定与制约着这一历史时期文学家的感情范围与感知创造。同时，也给文学思潮的形成发展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文学作为时代与作家情感的反映，它必然责无旁贷地承担起为社会变革、民族更新呼吁、为反帝救亡、民族生存呐喊的使命。龚自珍等一代志士对封建末世衰颓之象的揭露和对专制制度的批判，使梁启超等维新党人“若受电然”，心弦为之震动。梁启超倚重文学策动新民救国风潮的苦心，在五四文学青年群体中得到了广泛反响。改造国民性，以自我审视、自我批判的方式，抖落民族文化性格中迟钝、麻木、愚昧、沉闷和惰性的因子，呼唤深刻的、全民族的精神洗礼，成为 19—20 世纪文学家明确的价值取向和优秀传统。同时，不断降临的民族灾难与民族战争，疮痍满目的现实世界，也吸引着众多文学家自觉地为自身与民族的生存解放而呐喊，用文学的手段张扬民族精神中

^① 《寄陈独秀》，《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 53 页。

勇敢无畏、百折不挠的生存意志，增强民族抵御外侮的凝聚力，筑起心灵与情感上的万里长城。以巨大的热情和自觉，参与历史变革的进程，与民族的文明进步荣辱与共，这就是近两个世纪中国文学最显眼的思想特色。

这里，我们还想从一个新的视点、从救亡社会思潮、以及绵延一个多世纪的战争对文学思潮的影响的角度，来进一步探寻19—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形态的总体特征。

从19世纪初年西方“罂粟花文化”传入起，作为与之对抗的中国救亡文化、救亡文学就应运而生。如果说鸦片战争文学是近代救亡文学的第一曲战歌，那么戊戌变法时期诞生的小说、诗歌和散文，则可以说是救亡社会思潮催生出的坚实的文学果实。“五四”文学诞生于中国蒙受新的民族屈辱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其浓重的救亡色彩浸染于大量的反帝反封建的作品之中。至抗日战争时期，救亡社会思潮更成为普遍的时代情绪和文学心理，无论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这些文学思潮的发展，都和救亡社会思潮有着直接和间接的联系，甚至现代主义思潮的若干作品，也具有着救亡文学的某些特色。总之，民族救亡，既是笼罩于近二百年文学发展进程中的文化氛围，也是形形色色文学流派创作中的基本主题。

民族奴役还是民族救亡，是近代中国人民同侵略者斗争的焦点。这一斗争最激烈的形式是战争，在整个19世纪^①和20世纪上半叶，战争与动荡始终是弥漫于中国文学上空的怪影，连年不断的内战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此起彼伏，进入20世纪之后，这些战争又和两次世界大战紧密呼应。帝国主义的侵

① 鸦片战争虽然爆发于1840年，然而从19世纪初年至1840年之间，国内战争和反侵略战争，就要有发生。例如，1796年爆发的白莲教起义、1813年爆发的天理教起义、1838年英军侵占虎门的战争等等。

略战争和军阀混战给中国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与此同时，在反对侵略者的战争中，震耳欲聋的炮声，也馈赠给我们以极为深刻的精神洗礼：国内战争唤醒着广大阶级、阶层的阶级意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自觉地为自身的生存权利而战；民族解放战争更引起了民族意识的极度高扬，民族凝聚力空前增强。所有这些，都直接影响着文学观念的嬗变、文学价值取向的转换、作家感情意向的选择，带来了创作内容、题材、主题、风格、形式、语言的一系列变化，简言之，战争直接制约着文学思潮的流向。例如，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战争所带给作家心态上的危机感、紧迫感、焦虑感，迫使作家直面现实，作出新的审美选择，以服务于民族救亡为己任。战争也直接影响着读者的审美心理。战争催发了读者对于英雄的渴望与期待。人们希冀英雄出奇制胜，化险为夷；赞颂英雄为群体利益牺牲自我、为国捐躯的壮举。战争文学要求的是高亢、热烈、悲壮，枪林弹雨下息慢了春意融融、云雾缭绕的幽情。不少作品充满着自我牺牲的圣洁感情。不过，战争时期二元对立意识的强化，也使文学思潮的发展缺乏宽容的态势。我们看到的当时某些评论思潮的论文，往往表现出较少平等商榷、而较多一锤定音的、咄咄逼人的气势。以至几十年后读到这些文字，人们仍能品味出时代带给批评的几分酸涩，显然，这一批评风尚就和战时批评家的心理构架直接相连。战争也直接制约着中外文学思潮的正常交流，造成交流工作时断时续，并影响着翻译介绍工作的指向。译介工作中对某类作品的过分偏爱，厚此薄彼，等等，都和战时的政治需要分不开。

19—20世纪文学特殊的生成条件与环境，其所负有的特殊的历史使命，使19—20世纪文学思潮的发展在总体上显示出如下两个基本特征。

一是现实主义占据盟主地位问题。现实主义概念的引入是20

世纪初年的事情，而中国文学中“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古典意义上的现实主义精神却渊源流长。五四时期，以人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写实主义为主要表现方式的现实主义创作潮流，和以个性主义为思想基础，以浪漫主义为其主要表现方式的浪漫主义创作潮流，双峰并峙，浩荡奔涌，蔚为壮观。随之，以象征主义为其主要表现形式的现代主义创作潮流也彗星般地闪现。它们给 20 世纪的中国文坛，送来了前所未有的文学新风。然而，世易时移，20 年代末期以后，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虽然仍以各自的生存形态时隐时现地开拓着自己的文学疆域，而现实主义却迅速地发展为文学主潮，占据着本世纪文坛盟主的位置。文学思潮发展中这一格局的形成并非偶然，自有其强大的历史逻辑性将它们合理排演。第一，持续不断的国内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使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一部中国人民暴风雨般战斗生活的编年史，争生存、求民族解放成为中国人普遍的基本要求和社会心理，直面社会人生、注目人间沧桑，及时描绘现代中国人的现实斗争，成为多数作家长期的创作兴奋点。第二，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化心态，使文学消费主体的欣赏趣味，明显地趋向于现实主义。第三，从 20 年代末期开始，新文学就始终处于左翼政治思潮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和影响之下。世界左翼文化工作者和苏联文学工作者对现实主义的大力倡导，对中国现实主义思潮的发展，产生着直接的推动作用和示范作用。第四，中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度。农民的思想本质上是朴素的，现实的，现实主义在中国有着广大的群众基础。现实主义主潮地位的确立，使 20 世纪中国文学在创作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在现实主义的理论探索上，人们也做过一些有益的思考，根据现实主义的发展变化，作出了种种新的概括。仅在 20 世纪 40 年代就有“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新民主主义现实主义”、“抗日的现实主义”、“无产阶级现实主义”、“三民主义现实主义”、

“广现实主义”、“再广现实主义”、“民族革命的现实主义”等等提法；1979年以后，“心理现实主义”、“文化现实主义”、“荒诞现实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名目也骤起骤落，虽然这些主张和现实主义已有着根本的差别，但它们仍举的是现实主义的旗帜。撇开探索本身的功过不论，单是这些理论的提出，也已经隐约地显示：为了给现实主义开拓广阔的道路，建立现实主义的多种形态，发掘现实主义新的审美品格，人们曾经有过何等值得重视的思考。但是，也应该指出，由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现实主义思潮所表现出的独树一帜的气势，偏狭的理论个性，对文学的发展也带来了印痕清晰的限制。更不必说“文革”时期那种以政治权力为强大后盾的“假大空”的伪现实主义和“三突出”戒律对文学生命的残酷窒息和摧残。

二是由于思潮发展的过分匆促所带来的体系的不完整性。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来说，19—20世纪是变革的世纪，是匆忙的世纪，浮躁的世纪。急速而跳跃的时代节奏，中西文化大碰撞所带来的紧迫感，造成了人们难以抑制的浮躁心理，面对救亡与启蒙的历史重任，人们似乎总想在一夜之间挣脱几千年来传统文化积淀的重负而急起直追，迎头赶上，结果思潮的发展往往如鲁迅所说：“中国文艺界上可怕的现象，是在尽先输入名词，而并不介绍这名词的函义”，^①从而造成了文学社团和刊物开张与倒闭孪生的奇特现象；也如郑伯奇所云：“回顾这短短十年间，中国文学的进展，我们可以看出西欧二百年中的历史在这里很快地反复了一番”、“西欧两世纪所经过了的文学上的种种动向，都在中国很匆促而又很杂乱地出现过来”^②。到了80年代的十年间，竟对“五四”十年的“匆促”与“杂乱”重新上演了一遍。这种犹如走马

① 《扁》，《鲁迅全集》第4卷第69页，195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版。

②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

灯似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纷然杂陈的思潮更迭，在文学创作上，有时也带来了轻率趋时、追逐时髦、华而不实的风尚，鲁迅 30 年代在《扁》等杂文中尖锐批评过的这种文学现象，此后远未绝迹，当我们回首 19—20 世纪的文学创作，在赞赏其某些优秀作品相继问世的同时，也常常为其缺乏更多史诗性的作品而顿生无限感喟。这种感触也许就和思潮发展的这一总体特征密切相连。

三

坚持历史主义的态度，是我们描述 19—20 世纪中国文学思潮所遵循的重要原则之一。不能脱离时代和中国独特的社会历史进程去要求筚路蓝缕的拓荒者。重要的不是用今天的尺度和价值判断去评判文学先驱们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而应该把描述重点放到在文学园地里他们做了什么和他们为什么这样做，至于其他，则应该尽可能地留给读者。这诚如胡风所说，“举例说罢，因为自己享受到了文明产物的明晃晃的电灯光，就以为对于只能用松柴照明的时代的人们可以尽情地加以嘲笑，那并不一定就算得是‘高明的客观态度’”^①。但是，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文学思潮史只是文学思潮的简单罗列和历史事件、文学现象原封不动的照搬。追求历史的现代化、历史的主体化，即以今天的视野回顾历史，通过自己的感受来把握历史，仍是我们在写作中企盼实现的目标之一。

近代中国历史上，政治的、社会的、文化的复杂背景，使文学思潮的发展，呈现为错综复杂的形态。仅就一个作者而论，其政治、哲学、文学各方面的观点，往往相当复杂矛盾：或政治

^① 《为了明天·前记》、《胡风评论集》下册第 137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年版。

立场上是革命派，而文学主张却是复古的保守派；或前期锋芒毕露，所向披靡，后期则消极保守，败下阵来，恭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①就思潮发展来说，既有新旧思潮之间的回环交错，又有各种文学思潮的对抗，排斥，以及相互之间的吸收，融合，乃至完全消融，文学思潮发展的这种充满着交叉、回环、曲折、多变的复杂情况，要求我们审视时需要历史主义的理性目光。决不能削足适履，人为地用一条线，象穿珍珠一样把它打扮得过分有序和清晰。我们更关注的是文学自身的本来面貌。文学思潮自身发展所呈现的某种模糊性和若隐若现的连贯性、规律性，也许才是人们所执著追求的它的庐山真面目。这当然并不意味着我们面对零乱的、自在的文学思潮现象而放弃必要的耙梳整理和理论思维。

比利时科学家伊·普里戈金在一部研究当代自然科学哲学问题的著作中说：“本书叙述了一些新的方法，这些方法是近年来为处理耗散结构的产生和变化而发展起来的。在这里我们能找到一些象主旋律一样在本书始终反复出现的关键词：非线性，不稳定性，涨落。它们已经开始把我们的自然观渗透到甚至超出物理学和化学的固有领域之外。”^②这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的话具有经典的性质，他所概括的研究方法，事实上使我们在研究文学思潮时获益匪浅。“非线性，不稳定性，涨落”，几乎指出了我们研究对象的根本特征，也是我们向往的基本研究方法。近二百年文学思潮的涌动是如此的丰富和复杂，线性研究只能使我们陷于困境；而只有格外注目于思潮的涨落，才有可能梳理出文学发展的历史线

① 借用鲁迅小说《孤独者》中魏连殳的话，魏连殳这句话的全文是：“我已经躬行我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敬、主张的一切了。我已经真的失败，——然而我胜利了。”

② 《从混沌到有序——人与自然的新对话》第4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